

论陶渊明思想对地理困境的超越

方立娟¹

(1.暨南大学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陶渊明有着一定的地理情结,对于田园、山林等表现出了一定的情感,他也遭遇过地理困境,出任期间需面对路途的遥远、艰辛以及途中的归思,在归田之后,他又要面对新的地理困境,但他的文学乃至人生并未为地理所限,他实现了对地理困境的超越。陶渊明的思想不为地理所限的深层原因,包括天性的影响、独特思想的形成及“心不滞物”之境界。陶渊明在对天性进行思考时,不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成为自己,其思想受儒道释影响,却又有其独特之处。陶渊明不为某一种信仰或思想所限制,思想可以跨越地理的疆界,从而实现对地理的超越。

关键词:陶渊明; 地理困境; 思想; 超越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77

文学家受地理环境影响,但在某些情况下又可以不为地理所限。刘师培《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言:“试以晋人而论,潘岳为北人,陆机为南人,何以陆质实,而潘清绮?”²其实陆机虽为南方人,然文风与其入洛的经历有一定联系。《文选》李善在注《藉田赋》时曾引臧荣绪《晋书》曰:“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总角辩惠,摘藻清艳,乡邑称为奇童。”³即他这种文风在小时候就已展现,这似乎跟南北地理关系不大,毕竟一个人的文风除了受地域影响,也跟个人秉性特质等相关,刘师培又说:“一代杰出之文人,非特不为地理所限,且亦不为时代所限。”⁴有时地理因素可以在文学创作中起作用,却未必起关键性作用,杰出者可以跳脱地理限制,而陶渊明即是这样的杰出者。本人曾在《陶渊明文学创作对地理的超越》⁵一文中谈及其文学创作对地理的超越,然而文学技法上的地理超越与思想上的超越还是有区别的,有必要就陶渊明思想对地理困境的超越展开论述。

一、陶渊明遭遇的地理困境

陶渊明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田园、山林、居住场所的情感,他在出仕途中很想念田园生活,曾言:“园田日梦想(一作想梦),安得久离析(一作拆)?”⁶对于山,他也曾直言“性本爱丘山”,对于居住场所,他也有“吾亦爱吾庐”之言。渊明有着一定的田园情结,山林情结等,却也遭遇过地理困境。

陶渊明对田园怀有情感,出仕时却不得不离开田园,他对“吾庐”有情感上的寄托,有时却不得不面临迁居。渊明遭遇的很多人生困境,与地理也有很大关系,有的也可称之为地理困境,这包括出行困境,归隐之后的田园困境及居所困境。

在行役期间,渊明需要面对路途的遥远、艰辛以及途中的归思。“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一作田园)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渊明告别熟悉的园田去往异地他乡,归思却萦绕于心。他需要面对路途中的困境,这种困境从表层上看是远离家乡造成的,从深层次看则与其仕隐选择有关,这是一种仕隐矛盾引发的路途困境。这种困境不仅发生在去往异地的路上,也发生在从异地回来时,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一,

作者简介:方立娟(1988-),女,汉族,江西赣州人,于2022年从厦门大学毕业,现为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文学地理学、中国古代文学、华文文学。

²刘师培撰,程千帆等导读:《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62页。

³(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37页。

⁴刘师培撰,程千帆等导读:《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63页。

⁵《论陶渊明思想对地理困境的超越》以及《陶渊明文学创作对地理的超越》之主要内容皆出自本人博论,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收藏,详情见:方立娟:《书写与超越:陶渊明文学中的地理空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22年。

⁶陶潜撰:《陶渊明集》,宋刻递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文所引陶诗文皆出自宋刻递修本。有些不涉及异文或已在前文标注过的,则不一标注。

诗中虽未明言当日还得寄宿在外等事，但当天未返程的诗人，实际上却得面对在外住宿等问题，更何况思乡之情迫切，家乡似乎就在眼前，“延目识（一作城）南岭，空叹将焉如”又包含了多少无奈。

渊明《杂诗》其九言：“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他出门在外思归，却因路远而难以实现。《杂诗》其十一言：“我行未云远，回顾惨风凉。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边（一作鳧）雁悲（一作照）无所，代谢归北乡。离鹄鸣清池，涉暑（一作暮）经秋霜。愁人难为辞，遥遥春（一作喜）夜长。”¹雁与春燕都可跨越地理的界限，回归故土，离鹄也可经夏秋两季而返回清池，诗人言：“我行未云远。”却又久不得归。也许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出仕，而“投耒去学仕”的诗人却必须面对这些地理上的困境。

在渊明生活的时代，似乎走仕途才能施展抱负，但仕宦中很多事由不得自身，更何况身处乱世，“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行役之困境来自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双重影响。为职责所限，渊明数次都需离开故土为官，这与他本性里对家乡的依恋又相违背，哪怕是他后来在“去家百里”的彭泽为官，也是“眷然有归欤之情”。于他而言，出外地为官不仅要面对行役路上的地理困境，亦不免受地理空间所限，无法经常见到热爱的家乡，而在外又难以获得家的归属感。归隐后，行役路困境才得到真正解决，然而他又得面对新的地理困境。

外出需经济支出，而归隐后的渊明很难有额外的钱进行远地旅行，因而有时他不得不面临出行困境。即便是在家乡，渊明去耕作时可能需要经过较远的路途，其出行困境有时会影响田园体验和居住体验。

渊明在归田之后又遭遇了新的地理困境。自然界的气候等会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影响收成，从而影响他的生活。如他在《归园田居》中直言“常恐霜霰至”，桑麻类农作物遇霜易凋零，“常恐”二字说明这种担忧并非偶然。当田园遭遇旱灾时，加之“螟蛾恣中田”，导致收成不好，影响了诗人的物质生活。诗人归隐后遭遇的一些生活困境其实与地理也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再者，渊明的田园有远有近，有些去往田园之路偏远不易行，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的“地为罕（一作幽）人远”等。不过这点需辩证看待，从诗人喜爱自然的的角度而言，路远其实也是欣赏风景接触自然的机会，“荒野比田园更加自然，也是更少人涉足之处，给他更多的诗意和安宁”²，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需要获得粮食和蔬菜，路远的话会给他照顾作物带来一些不便，这也可称为地理困境之一。

陶渊明曾自言“爱吾庐”，有时又不得不迁居，虽抱着“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之心念，可戊申年房子遇火，却让渊明暂时面临“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的困境。

总之，人很难脱离其所处的地理环境而生存，而在农耕时代，也很难跨越几处地理环境而生活，在外地的渊明很难到达他记忆中的家园，而在家乡的渊明也很少有机会回到曾经的仕宦地。待他归隐时，其所安身的地理环境也存在着一些不稳定性，渊明有因火灾而迁居事，尽管迁居南村的他是欢喜的，却也意味着他在南村的活动变多，而在故地的行迹相对更少。他也有因荒年而不得不面临物资不足的情况，然而陶渊明的思维与心境并未为地理环境所囿，而是突破与超越了地理困境。

二、陶渊明对于地理困境的超越

渊明在归隐前几乎没有特别好的方法来解决所遭遇的地理困境，这种困境关乎其人生选择。渊明在行役路上就有辞官归隐之念，如“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又如“投冠旋旧墟（一作庐），不为好爵萦”，至晋安帝元兴二年，其想法又推进一步，这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即可看出。他对于躬耕“南亩”之尝试，也是提前对归隐生活的实践，但这并未帮助他真正摆脱行役路之困境，乙巳岁三月他还得踏上使都的路途。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一作拆）”，可他却还在奔波的路上，“终怀在归（一作壑）舟，谅哉宜（一作负）霜柏”，这时他已有了摆脱地理困境乃至人生困境的妙法。渊明使都后基本放弃了远役之事。据《归去来兮辞并序》，彭泽离家不过百里左右，担任彭泽令还有“公田之利”，然而这似乎并不能圆了他的田园梦，他自言“眷然有归欤之情”，其中的原因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是值得深味的。一方面做官的本质没有变，即使在离家近的地方为官，也会感到束缚，违背自然天性，据《晋书》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³另一方面，渊明乃“性本爱丘山”之人，尤其爱家乡的丘山。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去家百里”，公务在身，要回家也不易，“眷然”和“归欤之情”可见其归思。在离家近的彭泽为官，看上去是折衷之法，却依然回归不了他念想中的田园，又违背其天性。在尝试过一些选择后，渊明决定辞官归隐，这帮助他摆脱了行役路的地理困境以及一些心灵困境。

渊明在归隐后，也面临着一定的出行困境。他会通过精神式的远行来达到对出行困境的超越，其归隐后的精神远行跨越了地理的疆界。关于渊明的精神远行，本人另有文章详述。

¹根据语境，涉暑（一作暮）经秋霜之“涉”字后取“暑”字为宜，遥遥春（一作喜）夜长之“遥遥”后取“春”字为宜。

²方立娟：《希望之延续与自然之呈现：陶渊明的田园与田园里的陶渊明》，《海峡人文学刊》，2021年第4期。

³（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42页。

陶渊明在正式归隐之后, 还得面临不一样的田园困境。不过渊明有他的解决方式。“夏日长抱饥, 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 及晨愿鸟(一作景, 又作乌)迁”, 这是苦熬的方式。在遇上灾害以致农作物收成不好的情况下, 光靠苦熬很难维持, 也可能会出去借贷或乞讨, 虽说渊明《乞食》一诗的创作时间有争议, 但他归隐后在遇到粮食不足的情况下也有乞食的可能。辞官归田后, 陶渊明的心理与身份的转换有一定契合, 即他有时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百姓, 而未必是一个抱着大志又不得用的士人, 以这般心态乞食, 与农人交流, 不仅可解决暂时的温饱问题, 亦可得其中乐趣。

渊明还可通过调整心态及精神远行的方式超越田园困境。从《有会而作》的小序中可看出田园未必能供应足够的物资, “岁月将欲暮, 如何辛苦(一作足新)悲”, 当田园无法供应他生活的必需品时, 他说: “常善粥者心, 深恨(一作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 徒没空自遗。”其思维超越了他所处的地理环境, “斯滥岂彼(一作攸)志, 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 在昔余多师”, 除了在田园生活中感受悠然, 他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汲取生存和生活乃至生命的力量。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潏田舍获》中, 他言: “遥谢荷蓑翁, 聊得从君栖。”他不仅是一个农人, 其精神也可穿越时空, 以古贤者为伴。

精神的远行也有助于渊明超越居所困境。“诗人的天职是还乡, 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¹, 渊明在乙巳年正式辞官返乡, 回到了他曾经依恋之地。不过归家后他难免遇到一些难题。本人曾在《陶渊明诗文中的远行书写》中论证: “渊明虽然在乙巳岁辞官了, 但他真正意义上的家还是需要从精神上寻找, 这种寻找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寻找身心之安顿, 也是寻求一种精神回归。”²

归隐初期, 渊明居所方面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居所未必给他精神上的归属感。至《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他还有“仰想东户时, 余粮宿中田”之想法, 至《移居》, “闻多素心人, 乐与数晨夕”或许是对“仰想东户时, 余粮宿中田”的回应。“吾庐”固然可爱, 但迁居后也得到了另一种快乐。归隐后的精神远行及心态上的逐步转变, 让他跳脱了地理的限制。

三、陶渊明思想不为地理所限的深层原因

如前所述, 人容易受其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 但陶渊明的思想和文学创作虽受了一定的地域文化影响, 却不为地理所限, 自有其超越之处。陶渊明思想不为地理所限之原因, 亦值得探究。

1、“质性自然”: 天性的影响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评价自己“质性自然, 非矫厉所得”, 在《与子俨等疏》中, 他自言“性刚才拙, 与物多忤”, “性刚”与“质性自然”并不矛盾, “性刚”更不易为外界力量所屈, 有自己的原则, 才能更好地遵从本性。渊明在《归园田居》自称“性本爱丘山”, 又在《归鸟》中言: “遐路诚悠, 性爱无遗。”可见他对于自我天性有一个思考的过程。

渊明言“质性自然”, 可能受到了道家影响, 其“性”与今天所说的先天遗传因素有不一样之处, 但天性其实又与先天遗传因素有一定的关联。大卫·科恩认为: “遗传不只影响到我们的怪癖、性情、爱好或先天不足、神经症, 它还影响到我们的弹性、抵抗能力, 从早年的逆境中恢复的能力、自我决定能力、创造力以及对环境的应对, 其中包括家庭环境。”³又: “然而一个人的基因蓝图是不能被全部遗传给下一代的。我们只能传输一部分。也就是说, 父母只能随机地将其一半的蓝图传递给每一个子女。这就导致了个体间的独特差异。”⁴颜延之《陶征士诔》称渊明: “弱不好弄, 长实素心。”⁵又: “在众不失其寡, 处言愈见其默。”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曾评价其外祖父孟嘉: “始自总发, 至于知命, 行不苟合, 言无夸矜, 未尝有喜愠之容。”在《命子》中评价父亲: “于穆(一作皇)仁考, 淡焉虚止。寄迹风云, 置(一作冥)兹愠喜。”也许渊明的一些性格曾受家族环境或道教等影响, 却不能排除也有先天遗传因素。

老子曰: “专气致柔, 能如婴儿乎?”⁷婴儿有一种本真状态, 不像成人一样受到世俗干扰。回归婴儿状态, 不仅在于身, 也在于心。人的一些天性有时会被后天环境所遮蔽, 有时在世俗中逐渐迷失自我。“实迷途其未远, 觉今是而昨非”, 渊明辞官的心路历程也与回归自我天性有关。

渊明在《饮酒》序言中说: “纸墨遂多, 辞无论次, 聊命故人书之, 以为欢笑尔。”这说明他有意整理自己的

¹ (德) 海德格尔著, 郅元宝译, 张汝伦校: 《人·诗意地安居: 海德格尔语要》,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69页。

² 方立娟: 《陶渊明诗文中的远行书写》,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2024年第2期。

³ (美) 大卫·科恩著, 王大华、周晖译: 《遗传如何影响孩子的性格、能力及未来》,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年, 第9页。

⁴ (美) 大卫·科恩著, 王大华、周晖译: 《遗传如何影响孩子的性格、能力及未来》,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年, 第184页。

⁵ (清) 严可均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四),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第514页。

⁶ (清) 严可均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四),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第514页。

⁷ 李存山注译: 《老子》,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年, 第58页。

文集,但他没有追随潮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言:“江左篇制,溺乎(孙云:《御览》作‘于’)玄风……”¹不管是东晋的玄风,还是宋初诗坛争奇求新之风,渊明都没有主动去迎合,即使是在仕途上也没有为了迎合世俗而取巧,他不求名。这说明渊明其实并未丢失“质性自然”之天性,只是一部分天性暂时为仕宦所困,为世俗遮蔽而已。

渊明在对天性进行思考时,不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成为自己。在回归自我天性的过程中,渊明也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多因素综合作用下,渊明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

2、独特思想的形成

陶渊明的思想受儒道释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他善于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

渊明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这点已有很多相关研究,不赘述。渊明确实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不少精神力量,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诗人以颜回自比,《论语·先进》言:“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²颜回常处于贫困状态,在学问道德方面却接近完善,而他也能在“一簞食,一瓢饮”³的处境中不改其乐。在《与子俨等疏》中他引用了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⁴之言,他认为子夏之所以如此言,是因为穷达不可过分追求,长寿和短命是不能在命定之外去选择的。他对子夏此言的解读,似跟道家因素更契合,然而意义却又是从儒家子弟处所生发,可见他骨子里对儒家的尊奉。道家跟儒家思想之间又是有链接通道的,如《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⁵等,这也为很多古代文人儒道兼收的思想提供了一定基础。

尽管儒家也支持“无道则隐”,但很多儒家人物在战乱年代并未归隐,即便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⁶可他在经历了陈蔡之困之后,依然不忘宣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点,跟道家还是不同,而让渊明真正走向隐居的其实是道家 and 道教文化。这里说的道家文化主要是指以黄老、庄子等人的思想形成的文化。《史记》中《太史公自序》言:“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⁷道教则是有组织有团体有神明崇拜的宗教,在理论上吸收了一些老庄思想,但又对老庄思想有所改造。渊明所处的时代,天师道盛行,虽然目前未见典籍记载渊明是否信教,但他还是有受天师道影响的可能。

乙巳岁是渊明归隐的那一年,在乙巳岁三月经钱溪时,他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在同年所作的《归去来兮辞》中,他正式回应了这点:“既自以心(一作身)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道家教人脱离形体束缚走向自由,《庄子》言:“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⁸又:“物物而不物于物。”⁹而其“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一面,也与《老子》中的“道法自然”¹⁰有所契合。虽然渊明自幼习儒家典籍,但他性格里也有跟道家契合的一面,这点对他归隐选择的影响非常重要。

渊明还受道教文化的影响,渊明所处时代,不乏天师道信仰者,渊明家族中又有人信仰天师道,陈寅恪先生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言:“而陶侃后裔亦多天师道之名,如綽之、袭之、谦之等。”¹¹据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此传载谦之之名少一‘之’字,实非脱漏,盖六朝天师道信徒之以‘之’字为名者颇多,之字在其名中,乃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如佛教徒之以‘昙’或‘法’为名者相类。”¹²而詹石窗和程敏华认为:“关于六朝人以‘之’为名事,今查检道教内外文献,知其时名中带‘之’的人,信佛、信道或与之无关涉者皆有之。”¹³但不管如何,《晋书》记载了其叔父陶淡“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¹⁴他的从弟敬远也信仰道教,渊明一些作品也涉及对道教的认同,他受道教影响很深,但目前并没有典籍记载渊明自身是否有天师道信仰,李小荣认为:“刘宋新天师道经典《三天内解经》卷上所讲‘三天正法’即要求:‘治病疗疾,不得饮酒食肉。’从严格的道教戒律意义上

¹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7页。

²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115页。

³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59页。

⁴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125页。

⁵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82页。

⁶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43页。

⁷ (汉)司马迁撰,韩兆琦评注:《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636页。

⁸ 曹础基译注:《庄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2010重印),第18页。

⁹ 曹础基译注:《庄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2010重印),第229页。

¹⁰ 李存山注译:《老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¹¹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1页。

¹²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93页。

¹³ 詹石窗、程敏华:《陶渊明道教信仰及其相关诗文思想内涵考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¹⁴ (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41页。

讲,即便生病之际,也不能饮酒。”¹又:“当时古灵宝经对酒戒的特殊态度,完全契合于陶渊明的精神需求。”²从渊明的生活习惯看,他很难接受全套的道教戒律,未必是纯正的天师道教徒,只能说明他受过天师道的影响。

其实以渊明自我意识强烈的特点以及后来思想上的独特性,他的思想很难为某一门宗教所限制,且《晋书》把他和陶淡一起放进“隐逸”一类,介绍了陶淡崇尚仙道之事,却没提及渊明是否有这方面信仰。另,还可从天师道经典著作《老子想尔注》来分析,观《老子想尔注》的“情性不动,喜怒不发,五藏皆和同相生,与道同光尘也”³,这跟陶公性格倒有契合处。渊明及其家族中一些人的性格符合道教经典的一些要求,然而从渊明文学看,其个人言行未必完全符合道教经典,对于《道德经》的“智慧出,有大伪”,《老子想尔注》的批注有言:“真道藏,耶文出,世间常伪伎称道教,皆为大伪不可用。何谓耶文?其五经半入耶,其五经以外,众书传记,尸人所作,悉耶耳。”⁴此处的“耶”通“邪”,《老子想尔注》认为五经有一半入了邪文,然而渊明“游好在六经”,更何况他好奇书,还读《山海经》,《老子想尔注》还言:“道用时,帝王躬奉行之,练明其意,以臣庶于此,吏民莫有不法效者。知道意贱死贵仙,竟行忠孝质朴,□端以臣为名,皆忠相类不别。”⁵渊明并没有“贱死贵仙”,其生死观也是自然的,如“聊乘化以归尽”、“应尽便须(一作复)尽,无复独多虑(无使独忧虑)”等,这些认识更接近于庄子,与当时的天师道信仰有所不同。除《老子想尔注》外,渊明的思想跟《太平经》所记载的也未必完全符合,这点在后文会有提及。渊明受当时的天师道影响,但对某些教义其实并没完全吸收,甚至也有不一样的看法。本人在《连接与阻隔:陶渊明诗文中的山》一文中已提及陶渊明对于昆华仙境的追求到归隐后期之“邈然兹道绝”及“应尽便须(一作复)尽,无复独多虑(无使独忧虑)”等想法⁶,这其实也从侧面映证了渊明对于道教态度的一些变化,其实陶渊明在人生的后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渊明也不免受释家的影响。他在当时可以接触到释家中人,他居住在江州一带,很方便跟慧远集团打交道,且他跟慧远、刘遗民、周续之、张野等人也是朋友,从《莲社高贤传》来看,渊明有加入他们的机会,《莲社高贤传》:“常往来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以行。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⁷也许渊明很难遵守当时的佛教戒律,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他未必能够从思想上全面信仰一门宗教。

渊明于《归园田居》中言:“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一作虚)无。”“空无”这个术语,跟佛家有关。只是这里出现了异文,空,又作“虚”,曾本、咸丰本、焦本都有“一作虚”之记载,“虚无”也可跟道家有关,且“幻化”也有一定的道家成分。渊明作《形影神》诗,但道教也有关于形神的讨论,如《太平经》,而佛教的慧远也曾作《万佛影铭》。即使观点不一致,也很可能说明渊明对于佛教的一些义理其实也是思考过的。诚如朱光潜所言:“我并不敢因此就断定渊明有意地援引佛说,我只是说明他的意识或下意识中可能有一点佛家学说的种子,而这一点种子,可能像是熔铸成就他的心灵的许多金属物中的寸金片铁;在他的心灵焕发中,这一点小因素也可能偶尔流露出来。”⁸

对于有着独立思考能力,有一定质疑精神的渊明而言,他很难真正服从某一种思想。如他曾经对传统的善恶观提出过疑问,渊明言:“积善云有报,夷叔在(一作饥)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⁹关于善恶有报的理念,儒道两家皆有涉及,《周易·坤·文言》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¹⁰便跟儒家的善恶观相关。而《太平经》卷三十五言:“但当赏善罚恶,令使其分明□□,即善者日兴,恶者日衰矣。”¹¹《太平经》卷八十六言:“是故天者常佑善人,道者思归有德;故天者不肯佑恶人,道者不肯附于愚蔽人也。故常敕真人,以付归有德之君也。”¹²

然而渊明对于善恶有报曾有过疑问,他在诗歌中也没有避讳这种疑惑。值得注意的是,这或许可以从佛教中找答案。《莲社高贤传》有对道生法师之记载,言其“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及‘顿悟成佛’义。”¹³陈坚说:

¹李小荣:《陶渊明与道教灵宝派关系之检讨——以涉酒诗文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²李小荣:《陶渊明与道教灵宝派关系之检讨——以涉酒诗文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³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页。

⁴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2页。

⁵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⁶详细内容见:方立娟:《连接与阻隔:陶渊明诗文中的山》,《中华研究月刊》,2025年第2期。

⁷作者不详:《莲社高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页。

⁸朱光潜:《诗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2页。

⁹本诗末句“传”字后,宋本注:“空立言,一作立空言。”

¹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页。

¹¹上海古籍出版社校:《太平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48—149页。

¹²上海古籍出版社校:《太平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1页。

¹³作者不详:《莲社高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页。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乃是中国化的佛教观念，因为考诸印度佛经，其实并没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说法，至少没有这样的原话。印度佛经上有的只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说全了叫“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个佛教偈语，被称为“七佛共偈”。¹陈坚认为：“竺道生自己的相关论述以及当时佛教界围绕‘善不受报’的往来辩难基本上都已失之无存。”²渊明要解决关于善恶的疑惑，可能需要佛教的阐释。或许道生法师能够对渊明的疑惑作出回答，只是道生法师在庐山传法时，渊明未必听闻。更何况一来他儒道兼综，二来他也未必能守佛家戒律。

“结发念善事”的渊明，曾在《荣木》中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可见他在人生路上愿意向善。渊明曾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坚守气节的品质，也确实可流传百世。《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³立德也可以称“不朽”。不可否认，渊明自身有“立德”之想法，他在《形影神》中说“立善常所欣”⁴。“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一作目）委运去”，立德未必就能有美名，以渊明当时的身份和名声来看，他预料自己百世后可能名已不存，毕竟他没有主动迎合这个世界，故不免有“伤吾生”之慨叹，却也有“委运去”之释然。“应尽便须（一作复）尽，无复独多虑（无使独忧虑）”，浪于大化中的不仅仅是他的生命，也可能是他的声名，他把这些都看成是合乎自然的。是生还是死，是沉还是浮，是默默无闻还是流传百世，顺其自然而已。“应尽便须（一作复）尽，无复独多虑（无使独忧虑）”，出于本心，出于自然。

渊明曾受儒释道思想影响，但他晚年的一些思想有独特之处，是他自己内心的总结。渊明在人生的后期，其实能够做到《庄子》中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⁵，不过其思想又不仅限于道家庄子，这样的人，他不为某一种信仰或思想所限制，他的思想自然也可以跨越地理的疆界，不为地理与时代所限。

3、“心不滞物”之境界

山林对于渊明而言有着特殊意义，“性本爱丘山”，“托体同山阿”，山林是他情感的寄托之一，也是安放他去世后的身体之地。但诗人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一作为）尔？心远地自偏。”他喜欢山林，却不执着于此，田园对于渊明而言也具有不一样的意义，他曾眷恋田园，也能在田园中看淡。正因如此，他所描绘的景致更加显得自然动人。《古学千金谱》有言：“心不滞物，在人境不虞其寂，逢车马不觉其喧。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⁶这种“心不滞物”之境界与明代许学夷提及的“超然物表”之境界是类似的，皆认识到了陶渊明精神上的自由。

陶渊明“心不滞物”境界之形成，与其天性及其独特思想有一定的关系。“质性自然”也让他更不会执着于外物，更知顺时而为，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一作复）尽，无复独多虑（无使独忧虑）”的思想也让他超脱于现实的有形，而达到了心的自由。这种“心不滞物”之境界，大概形成于渊明归隐之后⁷。

“心不滞物”与地理情结并不矛盾，因人的情感在不同的时间，情境下可呈现不同的状态。在出仕途中，陶渊明很难做到“心不滞物”，此时心易为外在事物影响，即使他当时在文学作品中偶尔有超脱之词，可是却不代表其当时心境的超然。而他正式归隐之后，真正开始自然生活，虽然偶尔有烦忧，但也可以有“心不滞物”之际，这类思想有时也会反映在其文学作品中，明朝诗论家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说：“晋宋间谢灵运辈，纵情丘壑，动逾旬朔，人相尚以为高，乃其心则未尝无累者。惟陶靖节超然物表，遇境成趣，不必泉石是娱，烟霞是托耳。”⁸

陶渊明曾有过的行役路困境在归隐后得到了解决。而田园困境、居所困境以及出行困境也没有困住其思维。陶渊明的思想受地理影响，其实又超越了地理的限制。他曾设想出远郊的情景，表明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豁达，而他又在《自祭文》中说明了“不封不树”，这是一种在意，也是一种豁达。若真不在意，就不会有所交待。若真的过于在意，就可能会留下标志。生前有着地理情结的他，身后所归之地也是他关注过的。而生前思想超越了地理所限的陶渊明，希望自身的墓地“不封不树”，随岁月流逝，最后归于自然。对于今人而言，他的墓地也是一个谜⁹，可对于他本人来说，或许是归于自然。

¹陈坚：《“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²陈坚：《“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³杨伯峻译注：《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版，2011年第11次印刷，第1088页。

⁴“立善常所欣”之“立”字后有注，看不太清，似“一作主”。

⁵曹础基译注：《庄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2010重印），第397页。

⁶作者不详：《古学千金谱》，转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下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页。

⁷方立娟：《陶渊明文学创作对地理的超越》，《人文社科研究学刊》，2025年4月，第3卷2号。

⁸（明）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⁹本人曾经在博士论文第一章第一节中探讨过相关问题。

归于自然，是身体的回归，也是精神的回归，身体和思想联系着大地，又超越了所处的时空。

参考文献：

- [1]刘师培撰，程千帆等导读.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2]（南朝·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3]方立娟.书写与超越：陶渊明文学中的地理空间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22.
- [4]方立娟.陶渊明文学创作对地理的超越[J].人文社科研究学刊，2025，3(2):10—17.
- [5]（晋）陶潜.陶渊明集[M].宋刻递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6]方立娟.希望之延续与自然之呈现：陶渊明的田园与田园里的陶渊明[J].海峡人文学刊 2021（04）:145-150+156.
- [7]（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8]（德）海德格尔著，郇元宝译，张汝伦校.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9]方立娟.陶渊明诗文中的远行书写[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24（02）：69—73.
- [10]（美）大卫·科恩著，王大华、周晖译.遗传如何影响孩子的性格、能力及未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 [11]（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12]李存山译注.老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 [13]（南朝·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1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2版).
- [15]（汉）司马迁撰，韩兆琦评注.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6]曹础基译注.庄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2010重印）.
- [1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18]詹石窗、程敏华.陶渊明道教信仰及其相关诗文思想内涵考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 67-71+160.
- [19]李小荣.陶渊明与道教灵宝派关系之检讨——以涉酒诗文为中心[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5): 111—119.
- [20]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21]方立娟.连接与阻隔：陶渊明诗文中的山[J].中华研究月刊，2025（02）：20—25.
- [22]作者不详.莲社高贤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 [23]朱光潜.诗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 [2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5]上海古籍出版社校.太平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26]陈坚.“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39—46.
- [27]杨伯峻译注.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3版):.
- [28]作者不详.古学千金谱[M].转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下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9]（明）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The Transcendence of Tao Yuanming's Thought on Geographical Dilemma

FANG Lij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ao Yuanming has a certain geographical complex, showing certain emotions for the countryside, mountains, etc. He also encountered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which required him to face the distance, hardship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way during his career. After returning to the field, he had to face new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but his literature and even his life were not limited by geography. He transcended the geographical dilemma. The deep reasons why Tao Yuanming's thought is not limited by geography include the influence of nature, the formation of his unique thought and the realm of "heart not stagnant". When Tao Yuanming pondered on nature, he did not aim to become a better version of himself, but to become himself. His thoughts were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but also had their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ao Yuanming was not limited by any particular belief or ideology, and his thoughts could transce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thus achieving a transcendence of geography.

Keywords: Tao Yuanming; Geographical predicament; Transcendence; Thought